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昨日旧事残梦

报告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昨日旧事残梦

章含之

昨日旧事残梦

章含之*

一、走进外交部大楼

1971年3月末的一个早晨，北京的春天尚未真正来临，空气中仍有丝丝凉意。我背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黄色军用背包，里面装了一个当时大学里很时髦的当作茶杯用的果酱瓶，外面用五颜六色的透明塑料绳编织成各种图案的套子。其他就是我的转组织关系的材料了。我跨进了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来报到的！

对于从大学教师转行到外交部，我丝毫不觉得兴奋。对于我学习、工作，也可以说战斗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十分留恋。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我的朋友，留

* 章含之，女，1935年生，上海人。著有《我与乔冠华》、《我与父亲章士钊》等书。本文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节选（文汇出版社出版，2002年6月）。

下了我钟情的英美文学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外交部对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新的环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但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只能服从。当然，我最最浑然不知的是，从我跨进这个大楼的一刻起，命运就来了一个急转弯，从此我步入了一个深不可测、荆棘丛生的人生大森林。那里有极为壮丽的 70 年代中国外交的景观，有我的爱情绝唱；但也有急流险滩和猛兽陷阱随时准备吞噬我，也最终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机会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甚至深知当时他作的许多政治决定，其实那是误传。我的确有幸多次见过他，但大多数是在他会见外宾的场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点名参加的政治局一级的高层会议上。我和毛泽东主席的个别接触主要还是 60 年代初，我还是外国语学院一名英语教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去帮他学点英文，陪他聊聊天。回想那时我对政治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那时毛泽东大概是处于低潮的思考时期，他找我去学英语是一种消遣，而他正在酝酿的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而我却幼稚地与他大谈文学与政治题材在外语教学中的比例！

到了 70 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过不少机会见到他。但那时他的身边环境比 60 年代似乎复杂得多了，有不少人在争宠，也多有钩心斗角的帮帮派派，我其实都不在其中。70 年代我单独见到毛泽东的仅仅两次，一次是 1970 年 6 月，那一次他找我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调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

1972 年，我向他汇报根据他的指示，我在纽约会见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顾维钧的情况。两次会见都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政治。

此时此刻，当我面对青岛妩媚平静的大海动笔追忆这如烟往事时，一幕幕当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似醒非醒。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上晨雾，当太阳升至中天时，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庆幸能劫后余生，闯过了那重重的生死险关，活至今日，能冷静地面对历史。而这历史正是从 1971 年 3 月末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开始的。那一年我 37 岁，风华正茂的年龄！

我走进外交部大楼，到了位于二层的干部司办理入部手续。干部司里人很多，都很忙碌，有的干部刚从国外使、领馆回来，有的正要去赴任，好像我是惟一新调入部的。最终有一位大概是处级干部的非常公事公办地为我办完了手续，通知我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叫我拿一张条子到亚洲司刘春司长那里报到。我有点不解。1970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主席召我到中南海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调我到外交部时曾说：“你这位女同志，能说能写，也敢说。你先去外语学院干校搞外语教改，编写新教材，筹备招新生。办完这些事后你就不要留在学校了，我要调你去外交部。中国需要你这样的女外交官。”他还说我可以当新闻发言人。我以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会去新闻司，却不知为何把我派到了亚洲司四处的巴基斯坦组。说实话，那时候我对南亚次大陆一无所知，对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更是如同在另一个星球。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的。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

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

那时的亚洲司在四楼的东侧，司长是刘春。刘司长曾是军人，听说来部前是少将军衔。他是个非常认真、敬业的领导，我觉得他特严肃。来亚洲司前刘春曾是驻老挝的大使。司里同志曾传说关于刘春的一个故事：

当刘春在军队服务时，他的级别使他拥有秘书、勤务兵及专车的待遇。但到了外交部，一个司长却什么都没有。秘书是司里共用的，代步是一辆旧自行车。一日，刘春的一个老部下荣升，请老首长一聚。刘春骑了他的自行车欣然赴宴。饭后告辞出来，老部下命勤务兵：“把首长的车子开过来！”勤务兵面有难色。刘春急忙解释：“我是骑自行车来的。”老部下大为不解，说：“首长到了中央大机关外交部，怎么连专车都没有呢？”刘春说中央司、局级干部都不配专车。老部下于是命令用他的专车送老首长回去。刘春急了，说：“不行，我明早还要骑自行车上班。”老部下想了一下，于是命令勤务兵骑上首长的自行车，跟在汽车后面，送首长回家。我从未向刘司长询问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过我挺相信的。在那个年代，像刘春这样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胜利后却不计个人名利，服从组织分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干部，今天回想起来，更令人起敬。记得大约是今年初，我在程远行同志撰写的关于王炳南一生的那本书的首发纪念会上又见到了刘春。他已显苍老，却依然朴实。我没有打扰他，同他打招呼。从感情上，我不想留下任何外交部那一段经历的阴影。多年来，我尽量避免参加外交部的活动、接触外交部的熟人。我真的不想让昔日痛苦的记忆再来扰乱我平静的生活。

刘春简单向我介绍了亚洲司及我要去的四处，又介绍我见了几位副司长，于是就带我到了四处，由唐叶文处长把我最终接收了。

亚洲司四处在最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主管着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大国以及尼泊尔、阿富汗、不丹、锡金和斯里兰卡各国。处长唐叶文是印度问题及中印边界方面的专家。我在外交部十年，唐叶文大概是我惟一的属于外交部“老人”中的朋友。她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在一个偌大的名利场中，她是少有的不计个人名利升迁的好人。

小唐热情接待了我，使我从踏进这座楼以后第一次感到有一丝轻松。她介绍了四处的工作，告诉我今后分在主管巴基斯坦的一组里，由一位邵姓老同志带领我熟悉业务。

我终于在楼上楼下不断会见众多的陌生面孔之后在唐处长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那张大办公桌前坐下了，这小小的一平方米将是我在这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间里的个人角落。我的对面是一位主管阿富汗的姓马的老同志，他会说普什图语。我的斜对面是那位邵先生。他那时四十开外，也属外交部“老人”。短小的身材，深度近视眼，镜片至少 1000 度以上。我向他打招呼并说今后要请他帮助。他客客气气地答应着，但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有我这个外来者进入他的领域。我请问他我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邵先生似乎早有准备，从抽屉里拿出了三件东西——一把很长的尺子、一把很长的剪刀以及一瓶当时文具店里惟一能买到的装在一个极为粗糙的小玻璃瓶里的糨糊。邵先生说：“你把这三件东西收好，你每天要用它们工作。”我莫名其妙！我来参加外交工作，为何要这些

做手工用的工具？邵同志是个慢性子，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你每天的任务是看上下午各一本的《参考资料》（当时的内部国际新闻资料，由新华社编发），凡有关你主管的巴基斯坦的消息，你就把它们剪下来，交给我作为调研资料。剪刀自然是裁剪新闻所用。尺子是让你先划好道，可以裁得整齐。裁下来后用糨糊贴在废纸上，钉起来再交给我。”我目瞪口呆！“文化大革命”前，我已是外语学院助教讲师交叉级的骨干教师，并且是王佐良教授领导的英美文学教研室成员，我也已参与开设英语系英美文学讲座课，主讲英国19世纪女作家的代表作。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如今，毛泽东主席调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务却是每日剪贴新闻稿！

我初入外交部的沮丧还不仅如此。离开了我熟悉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外交部这个官衙门人情淡薄，对一个新来的人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热情。我很不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各扫自家门前雪的人际关系，也不习惯严格的上下级区分。我总是怀念我的校园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得自在、随意，也充满了人情。我们都有自己的好友，兴趣相投，谈人生，谈文学，海阔天空，系里的领导也都像亲近的朋友。我们都住在学校宿舍，闲暇时，三五成群，骑上自行车直奔香山。为了追求年轻时代的新奇刺激，有时候我们不买门票，在周围老乡的指点下，从一个偏僻的山坡爬到很高处，钻进一段公园围墙倒塌的缺口，那里已近“鬼见愁”，再千辛万苦地踏着少有人到的小路下山到香山前门，并为这冒险欣喜万分，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骑车回学校。如今，一天八小时我被锁定在这张办公桌前剪报、贴报、抄电报，我实

在是烦透了，我在寻找机会重返校园！

使我备感难堪的还有我对外交规矩的不熟悉。我搞不懂这电报怎么分了那么多类别：绝密，机密……什么级别的人能看什么密级都有严格规定，而我当然是最低一档，只能看我主管国家的普通电报，千万不可拿错了别人主管的或别的密级的夹子。邵先生关照我，每天早晨在司办公室看完电报要记住哪些是要办的事。在我所能看的密档中，一般都是些两国交往中的琐碎小事。记得我开始工作后不久，一天早晨我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去看电报。当时中巴关系很好，要办的事也较多，我因为很多事不熟悉，担心自己记不住，所以想做一点摘记带回处里办。当时的司办是间大房间，进门靠窗是两位秘书，靠门是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放着各处的收报夹，全司干部除了正、副司长都来此看电报。每个人都自觉地拿自己主管的那个夹子。我刚提笔做摘记，就听到窗口那位姓路的司办秘书叫道：

“四处那个新来的，过来一下！”

我想他必是叫我，就走过去问他什么事。我们之间就有了以下这段对话：

路秘书：“你是四处新来的，姓张是吗？”

我：“我姓章，文章的章。”

路：“你刚才在干什么？”

我：“看我主管的电报。”

路：“你带个本子干什么？”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小邵说要我记下要办的事。我怕记不全，做点摘记啊！”

路很认真地盯住我看了几秒钟问：“你看过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吗？”

我莫名其妙地答：“当然看过。”

路：“你这几天最好再去看一遍。”

我有点不高兴，问：“为什么？”

路秘书这时才转到正题，开始训话：“受教育啊！你知道李玉和、李铁梅一家是为什么献出生命的？就是为了保卫地下党的一本密电码本。知道什么叫密电码吧！它是要用生命去保卫的。你倒好！把密码电文往自己的本子上抄！丢了怎么办？如果被敌人拿去，你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所以我建议你再去看看《红灯记》。保密教育！”

我直直地站在路秘书的桌子前，那份难堪难以形容，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去挨训，可是我是一个年近四十的大学老师，这外交部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我从眼角的余光中斜视当时围在大桌边看电报的各处同事，看到他们忍不住都在窃窃暗笑，朝我们这边看。那一整天，我的心情坏透了，觉得外交部真不是我呆的地方。

现在回想，这事是真够逗乐的！其实，路秘书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后来相处得也很好。他长我几岁，我那时就像别人喝茶用带盖的茶杯，而我却用五彩塑料套的果酱瓶那样，大概带着一股校园气息，显得比那些老练成熟的外交官们要年轻、幼稚，所以老路很长时间叫我“小章”，直到我“升了官”。他大概是司里惟一这样叫我的人，足见他对我的友好。他是机要秘书出身，当时他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而已，只是我这个校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许比较清高吧，所以难以接受中

央机密单位的这些规矩。

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重复着，我百无聊赖，朋友们都远在湖北沙洋的外院干校。那里除了军宣队办公室，没有电话。想一吐心中的郁闷只能靠写信。“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业务尖子”都打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学业荒废多年；到了外交部又整日看《参考资料》，剪报、贴报、起草电报，烦闷使我无心看书。当时四处已有一位资深的英语翻译，所以翻译的任务也轮不到我。有一次，有一个巴基斯坦代表团访华，人手不够，临时派我去陪同参观地下铁路，这个团的主翻是冀朝铸。但像这类参观一般由低一级的翻译担任。当时北京地铁刚刚建成，尚未正式运行。车站的负责人介绍说这车站有电梯和乘客用的滚梯。我将近五年没有讲过英语，也没有看过英语，一时竟心慌意乱，翻不出来。我急匆匆求救于冀朝铸，问他：“小冀，这电梯和滚梯英语怎么说？”小冀大笑，他开玩笑说：“唉呀，你这教授怎么连电梯是什么都忘了！电梯是 elevator，滚梯是 escalator。”他像对自己妹妹那样拍拍我的肩说：“下次别忘了！”小冀是个特好的人，他总以善心待人。这件小事我相信他转身就忘记了。但如果不是小冀，那恐怕外交部的翻译室和亚洲司都会知道外语学院来的高材生、骨干教师、“业务尖子”竟连电梯和滚梯的英语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就在我无所事事地在亚洲司混日子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却正经历着一个世界外交史上永远留下光辉足迹的时代。一件震撼世界、改变世界的事情在这年的7月发生了——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

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崭新的一页，也从此改变了世界的大国格局。

1971年7月，天气炎热。外交部的绝大多数干部仍在朝八暮五地上下班，但是敏感的一些人都注意到了当时已渐露头角且形影不离的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部内“失踪”多日。由于她们的特殊身份，有人猜测“上面发生了什么大事”。7月16日清晨，中美双方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在外交部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中午在食堂，我见到了“失踪”多日的两位小姐。她们神情亢奋、喜形于色，一直被人包围。从新闻公布之时，大家都猜到她们与这次重大外交活动有关。也是从这时开始，两位小姐牢牢地掌握着中美关系的实际领导权，因为她们代表毛泽东传达他的一切指示，自然这也奠定了她们在外交部里的特权地位。

正如人们已熟知的，基辛格的那次秘密访华是中美双方极为成功也极具戏剧性的一次划时代的外交事件，其牵线者恰恰是我所主管的巴基斯坦当时的总统叶海亚。但那时的保密工作十分严密。我们这些主管的普通干部自然一无所知，就连主管司长也不知情。

基辛格于1971年7月8日以访问巴基斯坦为由到了伊斯兰堡，表面上是与巴方进行会谈。随即美巴双方宣布基辛格由于不适应炎热的气候，肠胃不适，巴方请他到巴基斯坦北部凉爽宜人的莫里山区去休养数日。众多记者也随同去了莫里山。基辛格到达避暑地后果然闭门不出，养起病来。记者们见无新闻可寻，索然无味，也都游山逛水去了。此时，一架中国方面包下的巴航专机却已悄然飞抵莫里机场，清晨，当

所有人都还在南亚少有的凉爽山风中做着美梦时，基辛格一行六人静悄悄地登上了这架飞机，直飞北京。访华消息公布后，所有随基辛格去莫里的西方记者把丢失这条新闻视为最大的终身憾事。后来有报道说，当时其实有一位可能是英国的记者因为去接人，恰好在机场。他远远见到一行西方人在一些中国官员陪同下登上了一架飞机，为首者酷似基辛格。他回到住地急忙往他的报社发了一条消息说基辛格有可能秘密去了中国大陆。他的报社根本不相信，没有采用他的新闻。这使这家报纸与这样一条可以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失之交臂，大概也成了他们作为新闻机构的一大憾事！

7月11日，基辛格离开北京飞返巴基斯坦。16日，中美双方宣布了这次成功访问，同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政府邀请将于次年5月前访华。为准备尼克松访华，基辛格将于10月来华作第一次正式公开访问。

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是毛泽东主席这位巨人以他的远见和勇气在他晚年为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使中国彻底摆脱孤立、隔离，从此作为一个大国参与到世界政治中去的惊人之笔。70年代中国外交势如破竹的胜利记载着这位伟人的不朽功勋。在外交部内，每个人都受到极大鼓舞。那些日子，部长们似乎比往日和蔼可亲，同事之间似乎更为密切，因为大家都以自己是一名外交战士而自豪。我也不例外。我这一代人是在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中成长的，尽管我们在革命成功之前，许多人受过的是西方教育，但经过二十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美帝国主义”早已是心目中的头号敌人。如今，这头号敌人的总统亲自来北京与中国和解，

这是多么扬眉吐气的时刻！个人的得失在强烈的对祖国的自豪感的心情中也就变得渺小了。

二、改变世界的七日

我想大凡走过坎坷人生的人，在回首往事时总难免会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假如”。有时与当年外语学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们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士生导师。于是我常常会感叹：“我如果不离开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导’了吧！那该多清高，多潇洒啊！”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你当然会是‘博导’，不过就成不了名人了！教书匠嘛，一生平平淡淡。”我想虽然我们是终身好友，但他们大概视我早已是名利场中人，耐不住寂寞，我只能报之一笑。

前几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亲当年没有把我带去见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即使见了我也没有叫我去帮他学英文；假如1970年毛泽东没有调我去外交部；甚至假如我与乔冠华没有相恋……任何一个“假如”都会给我带来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可惜我命运多舛，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历经磨难！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为人注意地呆在亚洲司，从冷板凳科员按惯例慢慢地升到副处长、处长，再出国当几任一秘、参赞，表现好还可当一任大使，然后回国退休养老，这虽然是个最糟糕的“假如”，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这个“假如”当然也是最不现实的，因为我在亚洲司默无声息地只呆了半年，情况就发

生了变化。这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调到基辛格接待组任翻译。

当时，我接到通知后非常激动。中美关系的解冻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能参与基辛格的首次公开访华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也是我接触到中国核心外交的开始。通知是王海容传达给我的。当时她已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掌握了整个接待工作。

我随即到钓鱼台四号楼基辛格接待组报到。那时，我对中央各部的领导几乎全不认识。我去报到时，大办公室里还是空荡荡的。我只见到一位大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穿蓝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扫房间，擦抹办公桌。他的模样特别朴实，我以为他是这楼层的服务员，负责打扫办公室。我问他是否在此报到， he 说是，不过管报到的人还未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这四号楼的工作人员，他笑笑，说他是接待组的。我坐在一旁静候，也没有去帮他打扫。后来陆续来人，我看进来的人都十分尊敬这位老同志，并且抢他手里的活，我心里就有些发毛。老同志收拾完办公室，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不记得是谁主持的会议，但当会议第一项宣布接待组成立并介绍成员时，我才知道那位打扫办公室的老同志原来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晖部长！后来，他一直积极参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代表团的五位正代表之一。

在这个接待组里，我第一次近距离与乔冠华一起开会。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冠华肺结核复发，正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没有参加谈判。10月，冠华已出院，毛泽东、周恩

来随即指定由他与基辛格就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准备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初稿进行谈判。我们报到的那天下午，乔冠华来到了接待组。看得出，外交部的干部对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欢接近他。不过，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觉却是在他颇为傲气的举止中有一种忧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夫人龚澎头一年刚刚去世给他的打击，还是他大病初愈的虚弱，乔冠华那天的情绪始终比较低沉。他给大家讲了中美关系的形势和这次的接待任务。记得他说重要的是要争取对中美公报达成一些原则的共识。他提醒大家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幻想一切都会顺利。谈完话，他谢绝大家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的盛情，上车走了。这与当时许多领导愿意在钓鱼台吃饭又是极不相同！

但是当基辛格到达北京，乔冠华与他针锋相对开始谈判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开会时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飞扬，说到谈判得意处，他那世界闻名的“乔的笑”就在会议室中荡漾，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谈判进行两天后，几乎陷入了僵局。乔冠华很气愤。但气愤之余，他也很讲策略，提议休会半日，由他亲自陪同基辛格游览天坛。当然，乔冠华是不会让基辛格博士轻松地漫步天坛的。他们两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后阳光下又开始了一轮台湾问题的激烈争辩。古老的天坛见证了这两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风姿才华！从天坛回到四号楼，乔冠华十分兴奋，看得出，他认为这天下午的天坛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说：“有些话在谈判桌上不好说，说出口就收不回来，弄成僵

局。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谈成功，要把原则定下来。可是在公园里散步吵架就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对基辛格博士说明年2月是你们的总统来中国访问，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如果公报谈不成，你们如何向美国人民，向全世界交待？我们倒无所谓，大不了再发表个声明说因为分歧无法统一，尼克松总统推迟访华。”乔冠华深知这一点击中美国要害。中美对峙二十年后，美国宣布他们的在位总统亲自到中国来访问。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尼克松在美国宣布这一消息时的激动。如今，由于中国不接受美国的观点，分歧不能统一而推迟访华，这是美方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乔冠华从天坛回来后的那种胜券在握的神态以及他那种充满自豪感的激情极具感染力。我觉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领导那样沉稳、谨慎，他更多是个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

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走后双方都加紧了准备。1月3日，美方的先遣队在黑格准将率领下抵达北京。这一次我被指派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译，可以说，从这次任务开始，我才被接受为外交部的主要翻译之一。

黑格与基辛格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和办事的作风。黑格不善于外交辞令，用非常直率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显然对当时的中国很不了解，以致后来他的访问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风波。

美方先遣队阵营强大，包括了访问的各个方面，其中有白宫办公厅主任查平和新闻秘书齐格勒。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中有礼宾司长韩叙。先遣队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是尼克松访华的礼宾细节。现在回想，难以置信当年美国的总统访华

能够接受那么多我们设定的限制。特别是我们坚持尼克松在我国境内必须乘坐我们的飞机以及我们提供的防弹红旗车。谈判一开始，美方坚持总统全程乘坐“空军一号”，美方要运来自己的总统座车，以及座车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卫人员。美方还要求我们提供总统所到之处有可能威胁他安全的人员名单等等。韩叙是个很策略的谈判家。他不紧不慢，总是很耐心，又很和蔼地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驳回，而且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强调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须乘坐中方提供的飞机，我们的总理会与总统同机，他们不必担心安全。座车和车上警卫也必须是中方提供。韩叙说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既然是美国总统来访，就要尊重和信任我们主人的安排。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座车。惟一的妥协是美方提出，2月27日从杭州到上海，尼克松总统愿邀请周恩来总理作为他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赴上海。周总理最后同意。这样的安排使双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为周总理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而从杭州到上海，则周总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该专机当时称“76精神号”）。大概在当时美国总统的出访历史上，这是惟一的一次总统使用所在国提供的飞机和座车。那时我们参加谈判的人员都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我们还没有喷气式飞机，周总理的专机也仅仅是苏制伊尔十八型号的螺旋桨飞机。我想美方保安人员肯定对总统此举惊恐万分。但是，作为中国，我们赢得了主权，尊严。最后，美方的代表无可奈何地对韩叙说：“韩先生，你实在太难对付了。凡是你提出的并要坚持的，你就说这是原则不能让步。凡是我們提出的要求你

不能接受，你就说要有‘灵活性’，要求我们改变。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最后总是带来对你们有利的结果。”韩叙却毫不露得意之色，谦逊地感谢他们的配合。

韩叙在礼宾、后勤方面的会谈总的还算顺利，在预期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致。此时，黑格准将的另一个任务是与中方对公报进一步交换意见。1月4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接见黑格，就尼克松访华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表示美国与中国存在着共同利益，但他说了一句话，被周总理敏感地抓住了。黑格说：“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他用了英语 *vibility* 这个词，当时被译成“生存能力”。周总理的浓眉顿时皱了起来，要求再译一遍。这次谈话主要是听美方意见，第三天再继续会谈。黑格离开大会堂后，周总理立即叫我们去把权威的英英大辞典找来，他说要查一查 *vibility* 这个词的确切意思，以便他第二次会见时回答黑格。周总理说如果这个词确实是“生存能力”，他要驳斥黑格。我们搬来了牛津大辞典、威伯斯特大辞典等权威性的英英辞典，证实了 *vibility* 这个词的意思。1月6日，周总理再次会见黑格，严厉地告诉他，我们不接受美方的这种提法，中国完全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中美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看黑格表情十分紧张，他在回答周总理时虽想辩解，但却很无力。我当时觉得这位将军也许是个优秀的军人，但却不见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外交家。他显然不是周总理的对手。后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就在1月6日晚上，周总理在人大大会堂会见黑格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毅元帅逝世了！会谈完，我们随

周总理往外走时，我见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神情凝重，好像目光不敢正视总理，我感觉有什么事发生了。乘总理去洗手间时，我们问出了什么事，才知道总理在与黑格谈话时，接到通知陈老总去世了。他们说：“今晚实在不想告诉总理了。他这两天因为应付黑格访问，已经太累。如果告诉他，今晚就一点都不能休息了。”顿时周围人全都肃静无言。一位中国革命的不朽功臣，一颗明亮的星辰陨落了，他曾身经百战，历尽磨难，而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他的晚年又遭迫害，生命结束于郁闷之中！

就在黑格在北京谈判的那几天中，有一天大约凌晨三点，我在民族饭店的房间里接到电话，要我立即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黑格会谈的情况。我赶紧迷迷糊糊赶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住所，见王海容、唐闻生已在那里。其他就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和张玉凤。我坐在靠近毛主席的沙发里，惊异地看到主席健康情况显然很不好。自从1970年6月我见到他，他调我到外交部已经一年半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腿肿得厉害，需要放在一个脚凳子上，神情也比较缓慢。他半躺在那张大单人沙发中，行动很不便。我顿时有一种悲怆的感觉——主席老了！

黑格北京之行结束后，计划沿着尼克松一个半月后即将走的路线走一遍，为访问作准备。因此，我们的第二站是上海，没有想到黑格的上海之行差一点造成尼克松访华的重大障碍。

1972年时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极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领导权。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当时不在上海，我们到上海时，

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贤。这个人本是个写文章的文化人，但当时已是上海的主要领导。当天晚上，他举行欢迎宴会，宴会的气氛很低调，显出与北京对尼克松访华在态度上的细微不同。宴会一开始徐景贤就讲了一个很短的祝酒词，我当时是黑格的翻译，我以为黑格会在宴会的中间或后面祝酒。但他似乎没有意思要回答，我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来，主人越来越不高兴。这顿饭吃得很压抑。回到锦江饭店不久，上海市外办的负责人就找了北京带队的于桑、韩叙，说黑格不回敬徐景贤的祝酒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举动，应当向他抗议。北京来的领导劝他们冷静，不要轻易行动。双方意见不一致。

第二天，按计划，黑格参观上海工业展览。我在陪同黑格参观时就感到上海外事的陪同态度冷淡，且交头接耳、心不在焉，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事情。果然，参观到一半时，上海外办的一位领导找到一边说《参考资料》登载美国发表声明将卖给台湾武器，他们要向美方表示抗议。我说这似乎欠妥，黑格是来准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这是中央的大局，不可因一些具体细节影响大局。中央没有指示，上海方面最好不要采取行动。但是，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十分狂妄，根本听不进去。他们随即将黑格叫出展厅，向他表示严正抗议。黑格似乎并不明白华盛顿究竟发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声明，显得有些茫然。他表示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后一半的参观气氛自然更为冷淡，只能草草结束。我们北京陪同人员中的年轻人对上海领导的擅自行为很气愤，要求带队的领导向中央反映。但是当时上海的权力为威震四方的一些造反派掌握，他

们中的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已调到北京任要职，带队的部长级领导与我们这些普通年轻干部不同，他们顾虑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影响，不敢轻易得罪这些造反派。我们与黑格一行就这样在当天中午带着阴沉的心情离开上海赴杭州。到达杭州时我记得已近下午二时。1月份的杭州气候阴冷、潮湿。飞机降落后，打开机舱门，我陪黑格首先下飞机。杭州方面来了一些领导，在飞机前站成一排，但他们每个人都表情极为严肃，毫无笑容。他们不像是在欢迎客人，倒像是在参加葬礼。在所有人下机后，杭州方面说要立即去西湖乘船。黑格的任务是提前走一遍2月底尼克松总统可能要走的路线，并作出最后的选择，其中就有乘船游览西湖。

虽然我们一路劳顿，尚未用午餐，但为了尊重当地领导的决定，还是放下行装就上了船。1月上旬的西湖上寒风彻骨。船舱内没有暖气装置，所有人都紧裹大衣。杭州的陪同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偶尔说一下西湖景点。船舱内的桌子上只有每人清茶一杯，常见的中国人好客表现的糖果、点心、水果毫无踪影。不用说黑格和美方人员，就是我们中方陪同也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饥寒交迫”中游湖，那西子湖此时此刻一点不显得妩媚动人，惟一的感觉是冷。

我实在忍耐不住，就跑到船舱口问一位杭州接待处的处长，为什么对客人这样不客气、这样冷淡。他们明知我们还没有吃午餐，为什么船内连一点水果、点心都不备。那个处长叹了口气，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原来的安排绝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船里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食品。但昨天晚上接到上

海方面的电话，说黑格一行对中国极不友好，要求我们对他们的接待‘降温’。我们不得不连夜撤走船上的东西。”

当天晚上，我们北京来的陪同人员开会至深夜，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很多同志认为上海方面的行为已严重干扰了毛主席、中央的对美工作方针。第二天中午黑格一行就要经上海机场转乘美方专机回美，如果不设法挽回上海造成的负面影响，必将不利于我们对尼克松访问的既定方针。北京来的领导开始时有些顾虑，但最后，同意打电话回外交部报告这两天的情况。

打完电话，会议还在继续，凌晨两点多，周恩来总理亲自来电话，他向带队领导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上海领导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在黑格离华前挽回不良影响。毛主席已亲自指示当时在北京的上海主要领导王洪文连夜飞到上海，在虹桥机场黑格转机时欢送黑格。毛主席并指示，听说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糖果，已指示上海方面连夜赶制礼品盒，所有美方代表团成员每人送十斤糖果以示友好。

我们大家欣喜万分，两天来的沉重心情此时总算松弛下来。早餐时，杭州方面的领导突然全部来到宾馆，一改昨日的严肃，竟是一片阳光灿烂，欢声笑语。而我看到黑格却是一头雾水，弄不明白这政治气候的“阴转晴”是怎么回事。

最为戏剧性的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当我们走进专用候机厅时，见到里面一片节日气氛，灯火通明，天花板上挂满彩带。本来只是准备稍事休息，用一点简单午餐就转飞机的，而此时厅内已摆满了筵席，准备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酒宴为黑格送行。王洪文等人频频举杯与黑格干杯，祝他完成任务，一

路顺风。我想黑格此时实在对中国人的这种变化莫测无法理解，十分困惑。他终于忍不住问我这个一直陪同他的主要翻译能不能告诉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犹豫了片刻，但还是决定告诉他。我说，“其实是一桩小事情。你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没有回敬祝酒，上海的领导认为你傲慢，对他们不礼貌。他们也告诉了杭州方面。后来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他们，叫他们的主要领导从北京赶来欢送你，希望你忘记前两天的不愉快。我们还是要一起把尼克松总统来访的接待工作做好。”黑格恍然大悟，虽然我想他并不理解，但他对我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忘记祝酒。他说欢迎宴会时，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祝酒。后来，他数次问我何时回敬祝酒最适宜。这顿午宴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在美方登机之前，上海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每个人赠礼。连夜赶制的糖果盒是一个用粉红色的锦缎裱糊在硬纸上的八角形礼盒。盒中分为八格，中间再有一圆格，共放九种不同糖果。当时的工艺很简单，均是工人手工制作，因为是连夜赶制的，所以送给美方时，糰糊未干，每个盒子摸上去都是潮潮的。黑格一行表示十分感谢，但因为他们的行李已全部送上飞机，而且这个装十斤糖果的土制锦盒硕大无比，当时又没有现在那些精致的包装可以携带，所以他们只能用双手捧着这些大盒子上飞机。我站在巨大的玻璃隔墙后望着这一长队的美国人手捧毛泽东主席亲自关照赠送的粉红色大糖果盒登上他们的空军专机，当时十分感慨。一个伟人可以扭转乾坤，而一些蠢人又可以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使历史倒退！

至于毛泽东说美国人喜欢中国糖果那也有一段趣事。在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时，他们一行住在钓鱼台五号楼。接待组在每个房间里摆了糖果。当时的国宾馆服务员因为严格要求政治条件，多数是来自外地工农兵出身的青年。他们从未见过美国人，对这个任务觉得很光荣，也很紧张，因此事事都来汇报。一日，服务员很困惑地汇报说美国人特爱吃糖，他们连糖纸一起吃掉，因为房内做清洁时未发现糖纸，可是盒中的糖全吃完了。我们大笑，告诉他们美国人一定是把糖带回美国作为从中国带回去的礼品了。这个笑话在我们见到毛主席时告诉了他，他很高兴，说只要盒中的糖没有了就马上放满。美国人爱吃中国糖的印象就留在了毛泽东脑子里。

送走黑格之后，我们也准备回京。此时接到北京传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体接待组人员返回北京后，一律不准解散回家，全体到外交部集中待命。我们立即意识到周总理要亲自过问上海发生的事情。

到北京后，我们带着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楼的会议室。年轻的干部没有思想负担，依然说说笑笑。但于桑部长等人深感责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总理将全体接待组召集到西华厅开会，严肃地批评了陪同团的领导没有及时报告、处理，语重心长地又讲了一遍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

接下来是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作紧张的准备。访问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应当是万无一失的，最难之处仍然是访问最后要发表的公报。而这部分最艰巨的任务是交给乔冠华与基辛格去完成的。当时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会谈。尼克松

与周总理本人的会谈都是在大的战略问题上求同存异。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众场合的参观访问。第二处会谈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罗杰斯国务卿就双边关系、民间来往进行的讨论。当时尼克松的对华方针全部交由白宫安全顾问基辛格处理，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实际上是坐冷板凳。周总理深知美方的意图，所以安排了罗杰斯对口中国外长姬鹏飞的会谈。当时周总理曾对尼克松讲，“让两位外长去谈双边关系，我们的外长也有他的局限性”。

当时最艰苦的会谈是就公报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的会谈，这个谈判在乔冠华与基辛格之间进行。他们两人整日躲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汇报会上见到乔冠华，总见他神情凝重，无心桌上的美味佳肴，却不断抽烟。

本来，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访问中，我的任务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妇参观访问。那是最为轻松的工作。我陪他们去长城，陪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厨房……但我刚刚轻松了两三天，在尼克松答谢宴会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松夫妇乘车时，尼克松总统突然对我说他已向周总理提了个请求，要求在他答谢宴会致辞时由我给他翻译，而不是欢迎宴会时为他翻译的冀朝铸。他的理由是周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的翻译是位女士（唐闻生），而他的翻译却是一位与他一样高大的男生，他的搭配形象不如周总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译来换冀朝铸。当时，我说冀的英语比我强，还是他更合适。当晚，我对小冀说我无论如何不能上去给尼克松翻译。不仅宴会厅的主宾有上千人，而且美国的新闻媒体来了近四百人，这

是当时与外界十分闭塞的中国从未见到过的场面。我说我经验不足，一定怯场。小冀一再鼓励我，我还是不敢。最后同小冀达成协议，北京的答谢宴会仍由他上，离开北京后，在杭州、上海由我上。当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么多美国媒体面前为美国的总统翻译时，不知怎么，突然一点都不感到胆怯了，只觉得十分兴奋，而且特别有信心能够翻好。这常常是我性格中不肯认输的一面。

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前，本来乔冠华与基辛格已经就公报达成原则上的一致，也已经毛主席、尼克松本人同意。到杭州时只需对文字略加润色即可。没有料到，就在离京前夕，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最终见到了公报草案后开始发难，提出不能接受这个草案，要求作实质性修改。一时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因为访问的时间仅剩两天，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在此时如此尖锐地表现出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公报的诞生。周总理和乔冠华都十分气愤。最后毛主席指示，除台湾问题外，其他问题可以有改动余地。于是，本来在杭州对周总理和乔冠华应当比较轻松的访问却变成了异常艰苦的谈判。因为杭州之后的2月27日是最后一天。假如公报达不成一致，在世界上的影响对中美双方都极为不利，尤其是对美方。当天晚上在杭州，乔冠华、基辛格彻夜不眠，周总理、尼克松也在各自下榻的宾馆等候他们的谈判代表的消息。只有被中方安排在刘庄的国务院罗杰斯一行无人去打搅他们，我想他们大概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尼克松、基辛格如何收场。

凌晨四点，双方终于达成新的一致。北京方面毛泽东主席也批准了新的草案。清晨，当我被派去刘庄接罗杰斯一行

去机场时，我见到他们国务院的官员一个个满脸怒气，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在大声议论，我估计是尼克松刚刚送给他们的公报最后定稿。见到我进去，他们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悦地跟我去机场。

按照事前商议决定，从杭州到上海，周总理及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乘坐美方的总统“76 精神号”专机。我们几个主要翻译也随同周恩来、乔冠华等领导登上了这架美国总统专机。原来想象美国总统的座机应当是十分豪华的，但实际上，“76 精神号”却相对来说是个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我们并未参观它的全部，但从它的作为会议、起居的机舱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相比之下，我在几年前应邀乘坐的美国都乐公司总裁的喷气小专机却要比当年的“76 精神号”豪华得多。我乘空隙时间告诉周总理我早上去接罗杰斯一行时见到他们拿着公报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后时刻还会发难。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到达上海锦江南楼（现贵宾楼）后亲自去拜访国务卿罗杰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达锦江之后，大家刚刚安顿下来，我就陪同周总理来到罗杰斯的套房。他的助手开门见是周总理只带一名翻译来访，十分惊异。从门厅我们见到虽然刚下飞机，但美国国务院的一帮人已经聚集在罗杰斯这里。他们都只穿一件衬衫，有的还挽着袖子，正在激烈地讨论什么事。见到周总理，他们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们的领带和西服上装。周总理神态自若，说大家随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来了，只是想看望一下罗杰斯国务卿，表示慰问。接着，总理说罗杰斯为打开

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感谢。希望尼克松总统访问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周总理巧妙地对罗杰斯晓以大义，表示中美公报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罗杰斯自然懂得周总理的意思，而且周总理亲自来访也给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顺水推舟说了些友好的话，没有与周总理争辩。美国方面内部在中美公报上的一场尖锐矛盾和斗争由周恩来出面缓解了，使得当天下午公报得以顺利宣布。

现在，每当我走在上海锦江北楼的院子里，见到那幢新造的会所时，我都会不胜惋惜原来在这里的那座历史性的旧礼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8日下午四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个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报”。当时的激动今日仍历历在目，只是当时主宰了改变世界的一代风流人物却大多数已被一抔黄土掩埋。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在锦江宾馆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上海公报宣布之时，中美双方举行了新闻吹风会。此时，当周恩来与尼克松相互祝酒时，世界已经得知了公报发表的消息。一周来双方的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暂时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世界打破了过去的冷战时代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次的宴会上，周总理询问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是哪里学的汉语。在有一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lel”这个词，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我们的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这自然没有错。但弗里曼

却提出了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 bar）始终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认为他们总统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以为如何译才是他们总统的原意。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虽然从我们翻译一般遵守的“忠、信、严”原则来讲，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但周总理对他仍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说他汉语的底子很好。在宴会上，周总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周总理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此时，周总理转过头指着我对尼克松说：“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八十多岁高龄还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作。可惜她没有学到她父亲的学问！”尼克松礼貌地表示很钦佩，弗里曼很有兴趣想知道我父亲完成的巨作是什么。周总理说父亲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体风格的。接着，周总理对我说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给弗里曼。此外，他还吩咐送一套《二十四史》给尼克松。当晚，气氛轻松热情，尽欢而散。

宴会后，中方代表团的同志连续苦干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礼宾司的人马还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是，我却为那套周总理许诺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午即起程回美，宴会散时已是晚上十点，我到哪里去找这套书？我请当时的上海外办主任替我去找。他答应尽量找到。但当时《柳文》是在毛主席特许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数极少，大概只有五百套，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所以他也表示为难。但这是周总理的许诺，而且弗里曼在宴会后告别时很认真地对

我说他期待明天登机前拿到我父亲的著作。我看来是必须找到《柳文》才能交待。但上海外办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又无能为力，一个晚上没有睡好。清晨六时，外办主任急匆匆跑来对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我接过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过的书，就问他怎么有些旧。他说实在找不到，最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里有一套，就拿来了。我听说是市委写作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于是他走后，我把上下两卷共十四本的线装版书籍逐页检查有无眉批、夹条。果然在书中找出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义复辟等等。我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对于尼克松的接待工作应当说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然而，由于我们那时缺少经验，因此有些事被美国的媒体看出其刻意的安排。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对我说他在高处窗户观察锦江前面的茂名路上的行人，结果发现同一些人，或看似情人或逛街者都是来回走这段并不长的路，两小时后换成另一批人。我们猜那是上海当地的安全措施。还有件事使我们觉得有些尴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区住房很紧，无晾晒衣服的地方。2月份又是阴冷季节，凡出太阳之日，老百姓纷纷晾衣晒被，有晾在家门口马路上的，也有从楼上窗口伸出一根根竹竿的。这是过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访问的那两天，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显得出奇地整洁。28日上午是个难得的冬日大晴天，阳光灿烂。不准晒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离开上海。于是，在“76精神号”起飞之后，当我们驱车回宾馆时，上海

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荡荡的冷清，变得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挂满了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外。当时美国四百多人的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后又回到市内，他们获准多停留一日，补一些采访和摄影。美国的这些记者们见到这种景象兴奋不已。其实我看他们后来的报道倒也并无恶意，只是我们往往要掩盖一些真实的现象，企图给别人一种毫无瑕疵的感觉，而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真实其实是最美的，虚假总不会长久。

尼克松访华期间，当时任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曾对我说要我离开亚洲司，调去美大司，因为今后美国的事务会很多，他急需充实业务干部。我自然很愿意继续做中美关系方面的工作。章文晋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应属世交。他的外祖父朱启黔（朱桂莘）曾任袁世凯时代内务大臣，在京城是名门望族。朱家的几位小姐都赫赫有名，其中六小姐的丈夫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卿。章文晋的母亲是朱家的大小姐。我父亲与朱桂老是好友，他曾做过朱桂老长子的老师。父亲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应朱桂老邀请暂住他在东四八条54号家的后院。没有想到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60年周总理来看父亲才发现我们一家一直住在朋友家中，立即下令为父亲寻找单独住所，这样我们才搬进了史家胡同24号。我们在东四八条居住时，与朱家关系很好，来往很密。章文晋那时去探望外公，见到我时，随辈分曾叫我“小姑姑”。我到了外交部当然他就不再这样称呼我了，但是由于我们两人都姓“章”，又听说我们早已认识，因此部里不少人误以为我们真是有亲戚关系。

我以为司长点了名要人，我又已经参加了中美关系的工

作，调去美大司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尼克松离华后，章文晋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没有办法调我，有人不同意。美大司的事他也做不了主，此事就作罢了，我又回到亚洲司四处。有一段时间，生活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整天处理一些琐事，下班回家看书。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我又一次想回到外语学院去，我找了曾在外院共事过的浦寿昌同志诉说我想回学校。可惜当时，我已身不由己，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

三、和元首们在一起

我的 70 年代短暂但充实的外交生涯留给我的另一个珍贵记忆是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过许多当年国际舞台的风云人物，国家元首。不久前，从新闻中看到尼泊尔王室的悲惨血案，十分震惊！我在担任外交部翻译的时候曾陪同陈锡联同志前往加德满都出席比兰德拉国王的加冕典礼，并曾在国内两次接待过国王和王后，也曾陪同国王的两个弟弟访问中国，他们中一个已遇难，一个是现在的国王。因为曾经与王室多位成员有接触，所以对于王室的惨剧备感惋惜。在我的印象中，尼泊尔王国是喜马拉雅山下的美丽宁静的一片净土。国王当时很年轻，也很英俊。山国的人，即使是国家元首也十

分纯朴、热情。

1972年国王加冕，世界各国派特使前去祝贺，中国政府派了陈锡联同志为特使，我担任他的翻译，我们第一次到了这美丽的山国。尼泊尔是个色彩缤纷的国家，国王的加冕典礼设在一个大广场上，临时搭建了一个绚丽的木板高台，左右两边各有五六级台阶供上下。加冕台的四周被各色彩旗、帐幕围住，五颜六色，在风中摇曳，加上那周围的佛教音乐击鼓声，使人感觉是在神话般的世界里。国王和王后端坐在台子中央的两把高椅里，接受各国使节的祝贺。使节们都被安排坐在高台的左侧，依次排队从左台阶上去，行至中间向国王、王后行礼，再从右边台阶下来。典礼开始前，尼泊尔外交部的礼宾官向各国礼宾官交待说，按尼泊尔传统，任何人不得将后背对国王，所以各国使节在向国王祝贺后不能转身下台阶，而要面朝国王退出几步，才能转身下台阶。看过现场后，中国代表团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那个搭建的台子并不大，国王座椅离台口也不过三四米。我们担心陈司令年龄已不小，万一方向掌握不好退多了，从台上摔下去，岂不成重大事故？！又听说新任大使向国王呈递国书也是这个规矩，那是在皇宫的一个大殿里，大使必须退至门口才能转身。有一个国家的大使就曾因为后退的方向感不好，越退越斜，倒栽进了殿四周的一个大缸里，幸亏那缸是空的，没有水。因为各国只能由特使一人上台，我们无论如何不放心让陈司令冒这个险。然而尼方却说这是他们的传统不能破。最后达成妥协，中国作为特殊例外，可由另一人陪同，替陈司令引路，我被委此重任。上台前我很紧张，生怕出什么差错，我设法

认准一个目标，测定大概距离。走斜线退出国王直视范围再转身。这场加冕祝贺成了各国使节一次倒退平衡的训练。那时的比兰国王仅 27 岁，坐在华丽的高椅中意气风发。他新婚不久，王后十分富态端庄。谁又能料到三十年后，他们会惨死于自己长子的乱枪之下？！

比兰德拉国王对中国特别友好。典礼后他单独会见了陈锡联特使，表示要加强尼中友谊。回国前，我们抽空去了一次喜马拉雅山麓。从加德满都驱车约两小时，我们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脚下。那里的空气清新得如同透亮的水晶，天蓝得让人耀眼。巍巍的雪山就在眼前，使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崇敬和威严。四周一片肃静，那种平和和宁静把人的心灵都净化了。我很久很久站在那里，似乎领略了皈依佛门的真谛。这里与喧嚣的现实生活相距如此之远，难怪看破红尘的佛门子弟有那样静止如水的心态！可惜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在领略了这份圣洁的宁静之后还是要回到那名利场的现实中去！

比兰德拉国王加冕之后的第二年，他和王后就来中国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因为外交部没有安排王后同去，主席发了脾气。那天下午，毛主席那里通知要会见国王。于是，国王与周总理的会谈暂停，立即前往中南海。礼宾司认为元首与主席会见一般都不带夫人，因此安排王后去友谊商店购物。国王一行在周总理陪同下到达主席游泳池住所，但当毛主席与国王握手之后环顾四周并问：“王后呢？！”我们赶紧解释没有安排王后参加会见。毛主席很不高兴，说马上去把王后请来。这时，情况大乱。主席关照摄影师等都不要拍了，等王后来了再拍。本来，摄影等新闻单位拍完就赶紧回去冲卷，

剪接新闻片以便第二天上报纸。他们在谈话开始后都不会在场。此时，毛主席一声令下，谁都不敢撤。礼宾司紧急派人赶往友谊商店，请王后立即随他们去见主席。谁知王后说她必须回钓鱼台宾馆换正装。于是车队在警车开道下从东往西到宾馆，急得礼宾司的同志满头大汗，最后赶到毛主席会见处。毛主席见到王后很高兴，与她握手时发现她戴了一个巨大的珍珠戒指。我想我们谁都不曾见过这么大的珍珠。毛主席此时似乎已经忘记这是戴在王后手上的珍珠戒指，他十分有兴趣地拉着王后的手仔细观看那颗珍珠，在场的人包括国王都不敢笑，也不敢提醒毛主席，只是年轻的王后十分尴尬。事后，我们猜想是在国王访问之前，有人向主席谈及王后年轻、端庄、美丽，主席很想亲眼一见。当我在王室惨案后从电视上重新见到国王、王后的照片以及后来他们遗体火化的场面时，我真是很伤感。当年的一幕近在眼前，他们是一对十分般配的王室夫妇，虽然来自尼泊尔小国，但却很有风度。可惜命运不济，竟未能有善终！

在我外交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富色彩的人物恐怕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人称“铁蝴蝶”。1974年，伊梅尔达来华访问，为其丈夫马科斯总统的访问作准备。那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在见过周总理等人后，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她，并正式告诉她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次就不见她了。我从未见过一位元首的夫人如此充分地利用她女人的优势作为外交手腕。当时我是翻译，坐在伊梅尔达和李副总理后面。夫人先是表示非常失望和难过，希望中方重新考虑。李副总理又一次说明并非毛主席不愿见她，而是确实

不在北京，请她谅解。此时，伊梅尔达沉默了几秒钟，随即取出一方手帕，开始擦眼睛，继而听到她细微的抽泣。一时间，李副总理不知如何是好。伊梅尔达接着把她抹眼泪的手帕轻轻地抛到茶几的李副总理一边，不再说话，也不告辞。李副总理望着面前那方手帕，不知是不予理睬还是应当捡起来还给她。最后，伊梅尔达成功了，李副总理答应她再考虑毛主席会见的可能性。伊梅尔达此时破涕为笑，热烈握手后告辞。她知道已胜券在握。最后，毛主席虽然眼疾很重，但还是同意会见她，我们用专机把马科斯夫人送到武汉会见毛主席，使她如愿以偿。第二年，马科斯总统访华，伊梅尔达出尽风头，也极其奢华。访问结束前的告别宴会是任何来访的国家元首都未曾做过的。宴会所用食品，甚至桌布，桌面的装饰、蜡台全部由专机从马尼拉空运到北京，蜡台是一朵朵半透明的盛开的荷花，每个客人前有一朵，宴会结束时请客人带回留作纪念。伊梅尔达的菲律宾民族服装十分高贵、典雅，她也很懂色彩的协调，那晚，她那袭淡红色底绣各色浅花的蝴蝶装的确倾倒了许多宾客。虽然那时的中国领导一般都很严肃，但不少人也禁不住对她说：“夫人，您今晚真漂亮！”我在伊梅尔达那一桌任翻译，领教了她那女人外交的手腕。她向她旁边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推荐一种菲律宾冷菜，味道类似我们的泡菜。韩部长尝了一口，礼貌地说：“很好，又甜，又酸，还有点辣。”伊梅尔达微微一笑，回答说：“是啊！就像我们女人一样！”老外交家韩念龙可能从未遇到过这种对话，一时很窘迫，不知如何对答。他的夫人在座，也是位老革命，十分看不惯，对我说：“这个女人太不像话。我不陪她

去小靳庄了！”后来，听说她果真拒绝一同去天津。伊梅尔达的外交手段看来是专门针对男性的！

而斯里兰卡的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却是完全不同的女性。她在丈夫班达拉奈克总理遭暗杀之后，毅然走出家庭，肩负起继承丈夫遗志、领导国家的重任。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贤妻良母的形象，端庄、大方、谦逊。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她对中国的感情，对周恩来总理由衷的钦佩。她几乎视周总理为兄长。1972年，班夫人访华。她与周总理会谈时，几乎没有两国元首会谈的官方气氛。班夫人向周总理介绍了斯里兰卡情况，真心实意地对周总理说她治国经验不足，中国是她的兄长，她来中国就是希望周总理给她出些主意。周总理语重心长，对班夫人说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帮助斯里兰卡，也愿意就各种问题与班夫人交换意见。但是各国情况不同，我们不能越俎代庖。当时，我一时翻不出“越俎代庖”，周总理对班夫人说，“你看，我们这些年轻翻译对古汉语知识太少。她的父亲很有学问，但是她却没有继承。我们的教育就有缺陷！”那次访问，周总理破例陪同班夫人前往大连，继续会谈。第二年，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中国政府派出徐向前元帅前往科伦坡主持落成典礼。我担任徐帅翻译。班夫人把中国特使安排在她的总理府内下榻。斯里兰卡是个崇尚佛教的国家，非常美丽。我们到达时正逢一个佛教节日。入夜，走在印度洋堤岸上，远处传来阵阵颂经乐声，寺庙中香烟缭绕，堤岸上散步的妇女穿着各种颜色的沙丽，在细浪拍岸的哗哗声中飘飘欲仙，真不愧是“印度洋一颗下垂的明珠”。

由于佛教的传统，斯里兰卡十分注重时辰的吉利。我们到达后，斯方的礼宾官一再强调大厦的大门必须在某一时辰打开，那时会鼓乐齐鸣。假如在那一时辰打不开，就会被认为不吉之兆，这个大厦就不能使用了。按计划，大厦的门锁将由徐帅开启，班夫人为首的全体内阁成员都会到场。我们听了都有点紧张，稍事休息，就随徐帅去大厦实地观察，发现那大厦的门锁是一般家庭用的那种普通小锁，位置也较低，需要弯腰才能对准。要求年迈的徐帅在两秒钟内那个时辰开启门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实在没有把握。徐帅说他练习几遍，但大多数情况都未能一下开启。斯方的礼宾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们建议，为了保证大厦的吉利，采用一个变通的办法，大门实际上由担任徐帅翻译的我来开启，但到时候徐帅的手压在我手上，假装是他开锁。中方礼宾官认为这样比较保险。但是风险转嫁到了我的头上，我自然十分紧张，不过练习了几遍，都打开了，我就比较放心。

第二天早晨到达大厦时，一派节日气氛。班夫人率全体政府官员列队参加典礼。身穿古代民族服装——披草裙、戴头饰的舞蹈队和乐队十分奇特，他们奏的乐器和击的鼓有的也都是古代的，吹的是一种兽角。斯方礼宾官说当兽角吹响的那一时刻就是吉利时辰。我紧张地等待着。后来就在那号角吹响的一瞬间，徐帅突然对我说：“我自己可以开！”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回答时，徐帅已把事先插入锁眼的钥匙转动，大门及时地打开了！观礼者欢声雷动，共庆大厦顺利开启，吉祥如意。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再看徐帅，却镇定自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老人家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勇士，我

想他必不愿被一把小小的锁难倒！

在我从事外事翻译所遇到的众多国家元首中，脾气最古怪的大概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总统威廉姆斯。他同周总理会谈时，一口气讲了 10 多分钟，不停下来让我翻译。我们那时的口译都不会速记，因此总统滔滔不绝地讲，我的简单记录已好几张纸，心里很紧张，怕回过头来记不住。周总理看出我的紧张，打断威廉姆斯总统说：“总统阁下，我是否可请你稍停片刻，让我们的译员翻译？”谁知对方说：“我没有被中途打断的习惯！”接着又往下讲，整整讲了大约半个小时，真把我急得浑身冒汗。旁边参加会谈的同志也都为我担心。幸亏那时年轻，记忆力强，基本都译全了。总统赞许地说：“她做得不错嘛！”

这位总统真是脾气古怪。我们陪同他访问上海时，他本来是要去赴一个晚宴的。但当车队路过一条大街，他看到路旁敞开式的小饭铺时，坚决要求停车，他要到路旁小铺去吃饭。我们的礼宾官不论如何劝他都不行，最后只得依他，急匆匆到这小店作些安全检查，就让总统进去了。进去后，他又不肯单独一桌，非要和就餐的老百姓并桌，弄得我们接待人员狼狈不堪，都说这真是一个怪老头！

我见到的最有个性的元首大概是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来访问时已是 1976 年春华国锋任总理的时候了。一般地说，外国元首来访都要会见毛主席，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及会见照片。那一次，尽管毛主席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但他仍然在 5 月 12 日会见了李光耀总理。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上午继续与华国锋总理会谈时，李光耀忽然出示了当

天的《人民日报》问华国锋说，你们刊登这条会见消息以及我的照片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华本来刚上台，经验不足，此时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说这是惯例，但李光耀仍坚持登他的消息和照片应当先得到他的同意。

在我所接触过的元首中，命运最悲惨的，除了尼泊尔国王和王后外，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统布托。他是中国真正的朋友，无论在位或在野，他始终与中国友好，曾经许多次访问中国，我也曾随中国政府的代表团多次访问巴基斯坦，与布托会谈。布托是个十分能干的南亚政治家。他口才极好，在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他受命于危急之时，赴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苏联支持下的印度对东巴的入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虽然东巴陷落，巴基斯坦被肢解，但布托的气节和慷慨陈词使他虽败犹荣。但这位在政治舞台上身经百战的外交家、总统，最后却被发动政变的齐亚·哈克将军投入监狱并不顾国际上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求情最后处以绞刑！因为他是我见过次数最多的首脑，当他被最后处决的消息传来时，我真是很难过，想起了与布托的许多次见面。也许，这世界上真有一种因果报应。布托被处绞刑若干年后，齐亚·哈克也在一次飞机爆炸中被暗害身亡。世界上的政治斗争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很残酷。

最后我应当提及的也许是美国的老布什总统。他是那种有平民心态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不是因为他身居高位，我们也许可以成为朋友。与老布什的首次见面是在1971年11月的联合国。当时他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由于美国政府那一年还坚持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老布什的任务是说服昔日支

持美国投反对票的国家继续投反对票。但由于基辛格的访华以及尼克松宣布将要访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联盟开始动摇。布什勉为其难，也不能挽回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1月11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此时的布什大使有点尴尬。但是他与乔冠华总是要见面的。于是布什大使设计了一次“巧遇”。正当乔冠华一行乘滚梯从底层到达联大会场那一层，即将跨出滚梯时，布什大使“刚好”从右边咖啡厅那边走过滚梯，两人“不期而遇”，友好地握手打招呼，解决了这第一次会面的问题。后来，因为中美双方在印巴问题上立场一致，因此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乔冠华与布什在联合国内很配合。

两年后，布什接替布鲁斯就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冠华那时是主管美国事务的副部长，他们中间常有来往。布什在北京时就喜欢与夫人骑自行车出去逛街。我随冠华到他官邸做客时，他们总要讲起他们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许多地方是我们都没有到过的。我觉得布什夫妇有一种平民心态，喜欢到生活中去，到老百姓中去。

再后来，沧海桑田，世事难料。乔冠华被整下台，有人故意延误他的癌症治疗，致使他于1983年9月逝世。而1989年，当年的布什大使已竞选成功，进入白宫成为美国总统。本来在一个美国总统与一个已经退出政治活动、退出外交生涯的我中间已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就在布什就任总统不久后的一天，女儿妞妞从纽约打来电话，那时她已在纽约工作。妞妞说她突然接到白宫电话，说布什总统说，我是他的老朋

友，希望了解我的近况，并通过妞妞邀请我去白宫做客。这使我颇受感动。在饱尝人间冷漠、心酸之后，一个只是工作上有过关系的外国人，一个美国的在位总统尚能想到十多年前曾经交往过的一个中国外交官，视之为朋友，这是很难得的。

大约一年后的1990年春天，我到美国时去了华盛顿，和女儿妞妞一起拜访了布什总统。他和芭芭拉热情地请我们到他的白宫二楼的金色会客室，这是他会见私人朋友的地方。我们追忆起昔日的时光，布什总统对在中国度过的岁月印象很深。那是一次轻松的朋友式的会见，我想假如布什不是贵为美国总统，他可以是一个很可以交往的朋友。只是总统的地位包含了太多的政治，所以从此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老布什。

三十年的时光竟是弹指一挥间。当年的风流人物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命运悲惨，有的却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但不管各自命运如何，那都是一页翻过去的历史，一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岁月不留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四、坐在中国席位上

80年代后期，我开始重返美国纽约，多数是出差，有一次是探望女儿妞妞。进入90年代，我每年差不多要去美国东海岸两次。但是在这十多次的访问中，我尽量避免回到东河之畔的联合国！尽管时光的流逝多少冲淡了心中的痛，但是乔冠华的名字与中国加入联合国是这样紧密地连在一起，每

每见到联合国大厦我的心又会流泪！我难以忘记那河边的玫瑰园，冠华在会议空隙时最爱在那里散步；我也依稀能重见冠华在草地上欣赏那里的雕塑；我更难抹去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安理会辩论的记忆，冠华独特的外交魅力使多少人看到中国的力量。还记得在联合国大会的咖啡厅里，只要冠华从会场出来休息，他的周围立即围满了各国代表，常常是两个人合坐一个矮凳，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听他讲话，听他豪迈的笑声。那时冠华还有一位美国的女性崇拜者。她名叫爱丽斯，是一位房地产中介商，专为联合国各国代表团介绍房产。她有一幅自制的地图，上面标明各国代表团驻地以及她推荐的房产。陈楚同志记不住她的姓名，总叫她“画地图的”。爱丽斯那时大约三十多岁，金发碧眼，称不上漂亮，但很有交际活动能力。据说许多代表团都是通过她购买了驻地房产，所以她经常自由出入各代表团驻地的招待会。爱丽斯开始与中国代表团接触是想推荐她的房地产，但很快，她被团长乔冠华吸引，大家都认为爱丽斯爱上了乔冠华。这成为代表团茶余饭后的一段佳话，因为爱丽斯对冠华一往情深，只要冠华出现在哪里，她就会在哪里。冠华在大会发言，她一定會在听众席的第一排，穿着非常引人注目的服饰。冠华在咖啡厅，爱丽斯又追随左右，坐在最靠近他的地方。她以美国人坦直的方式给冠华发了许多邀请，请他单独约会，到她家里去“喝茶”。遭到婉拒后，爱丽斯也会锲而不舍，跑到代表团驻地要求单独会见乔冠华。晚上不管冠华出席哪个招待会，都会看到爱丽斯的身影。这事后来弄得冠华有点尴尬。出于礼貌，他不好叫爱丽斯不要跟着他，但她确实成了一种干

扰。记得有一次，冠华出席一个阿拉伯代表团的招待会。到达后我们四面观察，告诉冠华今晚爱丽斯没有来。谁料，不到半小时，陈楚同志走过来，拉拉冠华的袖子，诡秘地用他的山东调笑着说：“老乔啊！那个画地图的又来了！”我当时是冠华的翻译，急忙四处环顾，只见爱丽斯在不远处，眼睛正凝望着冠华。我们没有找到她是因为那天晚上她换了装束，一袭金黄色绣花的阿拉伯长袍，长头发散落在肩上，与平时的职业女性形象大不相同。

爱丽斯的故事一直延续了两三年。她每逢冠华生日都会寄来贺卡，也不知她从哪里查出的。记得有一年她的贺卡是一张通红闪亮的画面，远处半个光芒万丈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近处的沙滩上，一对泳装情侣的侧影手牵手踩着海水在漫步。整个画面都是红色的，热烈壮丽。爱丽斯会算星辰，她在贺卡中说冠华生日之夜的几点几分，她和他的两颗星辰将相会。我那时真的觉得爱丽斯这样痴情挺让人感动的，不过冠华说这是胡闹。有时，我觉得女人的心要比男人柔弱得多。

前年，我在纽约遇到一位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朋友，谈起旧事，她居然认识爱丽斯，说她已退休，终身未嫁，现在独居在纽约。她还说爱丽斯曾多次打听乔冠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胜感慨，不知她是否是为了冠华终身不嫁？！我有种冲动，想把乔冠华后来的故事告诉她，但又想一个美国人又何以能懂得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呢？还是让当年征服联合国的那个乔冠华留在她的心上吧！

每当我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即使不去联合国大厦，那点点滴滴的往日回忆也会涌现在眼前。我曾多次走过五大道上

那白色镶金色的彼埃尔饭店。它让我想起 1971 年那次，冠华初到联合国就遭遇了印巴战争这一区域性战争。当时的印度军队在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境内长驱直入，要一举拿下东巴。苏联当时支持印度，中、美两国支持巴基斯坦，安理会内辩论十分激烈。巴基斯坦的大使夏希是个资深外交家，他后来曾任驻华大使。战争形势十分危急，巴方决定临时任命布托为总理兼外长，并立即派他来纽约参加安理会辩论。布托下榻的就是五大道的彼埃尔饭店。

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带了我们一行人去机场迎接布托。对于从未到过美国的我们来说，肯尼迪机场的硕大无边使我们完全搞不清东南西北。我们上了一条滚动带，却听到广播说布托所乘的那班飞机已到，是在另一个门。那滚动带很长，望过去不知哪里是尽头。我们决定半道跳出来。于是一群穿着单调颜色的“毛制服”的红色中国男女外交官开始冒险在滚动着的传送带上爬栏杆往外跳，惹得众多美国旅客目瞪口呆，也气得机场警卫大声斥责，要把我们带走。我们出示了外交官护照，告诉他们我们来接一个国家首脑，走错门了。警卫无可奈何，只得放过我们。

布托到达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代表熊向晖等即刻去拜访，共商对策。我是翻译。我们匆匆赶到彼埃尔饭店，那里的看门的及服务人员显然已得到通知，十分殷勤地为我们开门引路。但是，等我们拜会完毕出来时，他们的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同去的人中有人说在美国，周到的服务都要给小费，但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小费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谁都没有带钱，到了大门口只好自己开门。

我想，对 1971 年这桩同样是改变世界的大事应当从头说起：

1971 年 10 月 26 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祝贺电并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后一半二十六届联大。那时从周总理到外交部都没有思想准备。实际上，我们当时也以为这个问题要在尼克松访华后的 1972 年秋天二十七届联大时解决。消息传来，刻不容缓。我们需要立即答复吴丹。周总理与外交部商量后由外交部给中央提出了一个意见，大意是虽然联大通过了决议，但目前联合国被两个超级大国把持，成了他们的论坛，因此中国政府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意见被毛泽东否决，他说应当马上去。毛主席还亲自指定了由乔冠华任团长。

于是，形势大变。周总理兴奋不已，亲自主持了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乔冠华联大发言的讨论。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得出，周恩来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中国应当派代表团去出席。但那是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尤其是身在中央，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提错一个意见，就会招来灾难，轻则批判，重则罢官审查，连共和国的总理也不得不十分谨慎。周恩来始终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毛泽东巨大光辉的阴影中，因此尽管派不派团去联大其实是个国际常识问题，但周恩来宁可扮演一个烘托“正确决定”的配角，由毛泽东来作出去联合国的决定。他把光辉留给伟人，把委屈留给自己。今天的人们评说周恩来时，有人说他活得太累，也有人批评他不坚持原则。但我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我不知道周恩来不这样做又能怎样

才能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他自身的生存安全？

代表团定于 11 月 10 日起程赴纽约，从上海转机，先到巴黎，再转纽约。在此之前，由高粱带领先遣队赴美作准备。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及翻译都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除了乔冠华任团长外，急需决定一位副团长，他将留在纽约任常驻代表。在众多人选中，乔冠华推荐了黄华。黄于半年前刚刚赴任驻加拿大大使，因此周总理问乔如果把黄调去纽约，加方是否会有不满，认为我们不尊重他们，仅仅半年就把首任大使调走。冠华力陈派黄华任常驻代表的理由，并说加方由他去做工作。最后，这个建议被接受，决定通知黄华由加拿大直飞巴黎与代表团会合。

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主要成员，作了指示。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还关照，代表团离京时要高规格机场欢送，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席。动身那日，首都机场热闹非凡，彩旗飘扬，上千群众欢送。在京政治局委员全体到场。那一日，乔冠华成为真正的英雄，数千双眼睛注视着他，欢呼声簇拥着他，人们把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豪都托付给了这位才华出众的中国外交家。乔冠华登机前神情自若，眼中充满了自信。他于次日（11 月 11 日）从巴黎飞往纽约的途中，心潮澎湃，难以成眠，写下了以下诗句：

一九七一，
十一月十一，
万里大洋横渡，
一望长空尽碧。

此去欲何为？

擒虎子，入虎穴！

1971 年 11 月 11 日

冠华后来自己加注如下：“出国前主席多次找我们去谈话。最后一次，我问主席还有什么交待的，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另一首是：

百亩园中半是苔，

艾萧未尽兰花开。

边缘战士知何在？

前度乔郎今又来！

1971 年 11 月 11 日

冠华加注：“边缘战士指杜勒斯。1950 年 11 月，我与伍修权出席安理会控告美帝，第一次见到他。”

我们随行人员对当时的情景都深受感动，热泪盈眶。我们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在中国被孤立二十年后，我们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国的使者出席联合国大会，任重道远。我们意识到世界各国的代表将从我们身上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风貌，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此行不仅有鲜花和掌声，更有艰险和困难。当时台湾虽已撤出联合国，但是他们同美国尚有外交关系，台湾的“大使馆”在华盛顿，“领事馆”在纽约。他们不会甘心失败。此外，美国对中国也仍视为敌对国，对于他

们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企图的失败也是耿耿于怀。

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岁月悠悠，当年的一代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即使还在世，也已是耄耋老矣！我自己虽尚未到垂暮之年，但也早已青春不再。回想起那燃烧激情的岁月，无限感慨！但每当我想到昔日的英雄乔冠华最后的凄凉结局时，我不禁想，当年乔冠华的无限风光也许恰恰埋下了他后来遭遇的祸根。记得冠华曾对我说，他深知党内论资排辈的根深蒂固，所以他常常感到自己越是出头露面，越是如履薄冰。他曾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中先后被批判、处分，如果不是周总理惜才，保护了他，就不会有70年代为国增光的乔冠华，他恐怕早已被发配到哪个边远的省份去了。70年代中国外交的形势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造就了外交英雄乔冠华。历史证明，他是靠自己的才华、忠诚和渊博的知识赢得世界的赞誉的。然而，却有一些比他资历深的外交界的老同志忿忿不平，所以在后来乔冠华落难时，那些他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过患难的“战友”落井下石，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乔冠华晚年最大的悲哀！

乔冠华一行于11月10日到达巴黎，休整一夜后于翌日乘法航赴纽约。当时黄镇同志任驻法大使。他和冠华终身为友。在冠华最后遭到极不公平迫害时，黄镇是坚持公道的少数老干部之一。在冠华逝世后，他和夫人朱霖、宋之光大使夫妇以及宫达非、柯华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给予我同情与关怀的人，我永远感激他们！那时，黄镇大使在他官邸给予冠华及其一行十分热情的接待。他和代表团主要成员一起最后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联合国后的工作方针。我记得官邸的会议

室是一间全部都是暗红色装饰的舒适的房间。冠华与黄镇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促膝长谈至深夜。

第二天，我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班机赴纽约。大使和部长们以及主要翻译购买了头等舱机票。上飞机后，我们才发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沃特·克朗卡特和他的助手也在头等舱内。他们在纽约就开始跟踪乔冠华的行踪，并且神通广大地获知了乔和他的代表团将于11月11日乘法航班机赴纽约。于是，克朗卡特赶到巴黎，订购了同一架航班的头等舱机票。当我们最后登机，进入头等舱时，克朗卡特已稳坐在第二排等待着他要采访的人物的到来。尽管克朗卡特非常有礼貌地征询冠华意见是否能接受他采访，但这是一段横渡大西洋的漫长的飞行，如果拒绝采访，双方在这狭小的空间要共度十个小时，将会比较尴尬。当然，乔冠华可能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使对方非常兴奋。他们拿出录音机，问冠华是否在意他们录音。那是我们见到的第一架卡式录音机，其实是最早一代的砖头式的卡式机。采访结束后，克朗卡特取出录音带，诚恳地希望冠华接受他的小小的礼物——这台卡式砖头机。冠华请他干杯，他祝冠华成功。这是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接受的第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我们无不佩服美国新闻媒体的敏感和效率。

法国航空公司对于中国代表团乘坐他们的班机赴纽约十分高兴。他们也采取了保证安全的措施。但是也许他们过于谨慎，当我们在大约下午四点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法航的机组竟找不到打开舱门的钥匙。我们足足在飞机上等了约二十分钟，他们才找到那把藏得太仔细的钥匙。我们从机舱望

出去，那天纽约天气十分阴沉，寒风凛冽，来迎接的人并不很多，大概是以新闻媒体为主。其余就是联合国总部的礼宾司官员以及阿尔巴尼亚等二十多个友好国家的使节。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准备好的书面讲话，随即前往先遣队准备的下榻饭店——罗斯福饭店。先遣队预先已包租了十四楼的半个层面。

代表团的所有人，除了乔冠华和熊向晖，都是第一次到美国。一切都那样陌生，也那样新奇。从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到街上行人的“奇装异服”以及那五光十色的店铺橱窗，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难以想象的。我们在旅馆稍事安顿，大家最渴望的是喝一杯解乏的清茶。但是屋内没有暖瓶，于是大家找到我问我如何弄点开水。我查遍房中的“服务指南”，认为一定是打电话给那个叫“House Keeping”（管家）的部门。于是电话打到管家部，我说我们是十四楼的中国客人，我们要泡茶，需要热水。接电话的说：“你打开热水龙头就有热水。”我说我们是要可以泡茶的很热的开水。他说那你就多放一会儿，水就会很烫的。我说我们不习惯用洗脸池龙头里的水泡茶。那个人说那你只有打电话到房内送餐部了（Room Service），我打到送餐部，我说我们每个房间都要泡茶的开水。他说没问题，马上送来。十分钟后，有人敲门，开门见一位服务员手捧一个精致的银色盘子，上面放一个同样精致的玻璃杯，其中盛着热水！而此时，这也就是温开水了！其他同志都抱怨说这美国饭店怎么不给暖壶，我说今天就凑合吧！这几杯温开水价格不菲，是当作客房送餐计算的，外加小费！大家说这鬼地方真是资本主义，喝杯开水还算钱！

第二天，代表团后勤组的头等大事是上街买电壶及暖瓶，并且腾出一间小房专供大家烧开水之用。

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就是 1971 年 11 月 15 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那一天，当乔冠华到达联合国大会时，大门外已云集了许多记者。冠华由联合国礼宾司长迎接前往大会会场。记者蜂拥而至，在他的座位前抢占最佳位置。那一时刻，乔冠华成为整个联合国大厅的中心。所有人都驻足观看，“红色中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席卷着这个经历了二十年风霜的最大国际组织。中国终于昂首阔步地走进了这个大厅，打破了美国对她的封锁，参与到世界大事的重大决策中来，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和美国一样，拥有否决权。

我常常奇怪，冠华的性格极易激动，但是此时此刻，当我们很多随行人员激动得要流泪时，他却十分从容，似乎是去开一个平常的会议。他保持了十分冷静、镇定的神态，坐进了礼宾司长亲自为他拉开的中国名牌后的那张椅子。此时，有记者问他：“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有何感想？”冠华的回答造就了那张著名的后来获新闻摄影普利策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他笑得那样自然，那样淋漓尽致，一时间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他仅有的回答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那是胜利的笑，是自豪的笑，这联合国大厅内响起的乔冠华的笑声呼应着毛泽东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声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谁能挡得住这乔冠华的笑声？后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关于乔

冠华的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乔冠华就是用这豪迈的笑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联合国！

然而，接下来的联大会议却充满艰巨的斗争。印巴战争在大会期间爆发了！年轻的中国代表团突然之间面临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我们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没有自己的驻地，没有自己的保密通讯设备。中央离我们那么遥远，很难随时得到周总理指示，而战争又在快速进展。巴基斯坦军队节节败退，安理会天天开会至深夜、凌晨。我们与国内的联系一切都是明电明码，全部掌握在美国手中。幸而当时美国的态度与我们基本一致，都是支持巴基斯坦，反对苏联支持的印度当局肢解东巴。在安理会内中美两国都要求印度立即停火撤军，而苏联代表马立克却想尽办法拖延表决。他们想拖到东巴首府达卡陷落，战争自然就结束了，印度就占领东巴了。此时，美国方面提出先停火，停下来后再谈判撤军，但由于通讯的不便乔冠华没有得到国内指示可以暂不要求撤军。安理会紧张地僵持着，中国要求停火、撤军，马立克说莫斯科没有指示，而前方战场上形势十分危急。这天深夜，周总理从北京打普通长途电话到代表团，批评乔冠华还在坚持撤军要求。周总理说现在一切都要看前方的战局。只要保住达卡，一切还有谈判余地。一旦达卡失守，东巴就被分离出去了，不可能再挽回。因此现在美国人提先停火是正确的策略。先停火，停下来，达卡还在巴基斯坦手中。乔冠华连夜召集会议，商议新战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放弃立即撤军要求，但必须立即停火。苏联代表仍在拖延。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终于传来了印军攻克达卡，巴基斯坦守军投降的坏消息。一

场分裂巴基斯坦的战争以东巴分离出来为结局而告终。此时马立克在安理会发言说莫斯科指示已到，同意立即停火。当然这已毫无意义。停火已经实现，只是以巴基斯坦军队交出东巴投降印度为停火的代价。美、中、巴以及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都很失望。安理会通过了一张废纸的要求停火决议，巴方代表夏希愤起把决议撕碎，并率领全体巴代表团退出安理会。当时的气氛十分悲壮。

虽然这场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代表团匆促上阵，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了一个安理会大国应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对于这场初来联合国就遭遇的突如其来的战争局面，幸而有乔冠华才能在安理会上舌战马立克。但乔冠华自己却因这场斗争而疲惫不堪，身心的劳累使他焦躁、低沉；责任的重大又使他不得不以超出他体能的精力去应付各方面的工作。

12月18日乔冠华率部分代表团成员离开纽约回国。在从纽约到巴黎的飞机上，冠华回顾一个月来在联大的斗争，心潮起伏，写下题为“心事”的诗句：

离却喧闹地，
天高夜寂寥。
倦极不能寐，
心事如波涛。
万人争握手，
一语动群僚。
帮腔虽有人，

主犯终难逃。
黄发小儿何足道，
徒识挥拳其咆哮！
苏修胡言固可耻，
美帝软弱亦可笑。
独有堂堂中国敢讲话，
一百多个国家同声讨。
君不见：
四海翻腾云水怒，
犁庭扫穴看明朝。

冠华后来加注：“1971年12月18日，从纽约到巴黎飞机上。12月29日下午在北京作报告，夜不能寐，起又改一遍。”

乔冠华不负众望，载誉归来。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联合国，也让国际社会了解了新中国。他在国内民众中的威信也因此而高涨。然而，在这踌躇满志的顶峰，也同时孕育着他日后的灾难。第二年1972年的夏天，外交部酝酿第二十七届联大代表团时，向中央打报告建议由当时的外交部长任团长。冠华是想到激流勇退的。正如毛主席曾引用的诗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大招风啊！但是报告被毛主席驳回，批示说联合国的事还是要乔老爷去。当时的外交部长心中不快，他在党组会上发牢骚说不相信联合国的事要什么专家。1973年中美决定互建联络处，冠华已深感国内政治形势复杂，他无法应对，想出去工作一段，因此正式向周总理、毛主席请命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这次又被毛主席否决，他亲

自任命黄镇为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为此事他召见了有关领导，当场对黄大使说：“联络处的事由你去，你是大大使。乔老爷，联合国的事由你管，每年由你去！”冠华从主席那里出来，我看得出心里有点沉重，主席的这个决定一定有人不高兴。不知往后的日子是否凶多吉少！

最终的结局是乔冠华 1971 年第一次出席二十六届联大后名扬天下，却在五年后的 1976 年趁他出席三十一届联大时被国内种种势力结合起来推向黑暗的深渊，我在《十年风雨情》中讲到了这段历史。如今，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当年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仍然在激励着人们，乔冠华为此做出的贡献也仍然活跃在人们的记忆里。三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掩埋，而掩埋不去的是乔冠华一颗忠诚火热的心。乔冠华晚年时喜欢抄写刘禹锡的诗句。“淘尽黄沙始到金”，他相信有一天强加于他的如黄沙般的谰言终会淘尽，金子还是金子！

五、残梦、旧事

文章从冬日写到春至。眼前的庭院又是一片葱绿，可是文章却仍未收尾。不完全是忙，也不是懒，而是我真的不愿面对那个残梦！前些日子，一个结识不久、却谈起来很投机、性格上很独特的朋友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活得太累，太不值得！你不为自己活着，你永远生活在乔冠华的影子里！”她竭力劝我离开北京，离开这四合院，抛掉那个冷酷的梦，移居到我的故里上海，结识新的朋友，开始新的生活。她说这

样，你会快活得多！

我泪流满面。为什么一个新朋友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心的深处？可惜一切都太迟了，我在这残梦中已徘徊了二十年，生命留给我的选择余地已经太少太少了！我知道我其实十分脆弱，不禁一击。我何尝不曾试图挣脱那个三十年前的梦，重新开始？但是，茫茫人海，我又到何处去寻找我的归宿？

冠华如果善始善终，在他事业的光辉中告别人世，我会安心得多。但是，他受的冤屈实在太多、太多了。在他身后，除了我，又能指望谁来为他说话呢？我为自己背上这沉重的十字架，二十年来难以卸脱。

而那梦只是短短的五年。我自信如果不是那残酷的我们无法应付的党内斗争，以我的能力、才干，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无奈，我生不逢时，那环境是容不下我生存的。

我在外交部的轻松日子其实只是短短的一年多。到了1973年春天，我就意识到一场政治灾难就要来临。前一年的秋天，我正在联合国开会，被紧急召回接待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匆匆回到国内才听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和，他要撤换翻译，所以召我回来后备顶替。这时，我就听到了一些对周总理的非议，我很怕被卷到一场上层的风波中去。7月1日，我父亲在香港逝世。7月4日，我还在香港时，毛主席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五人谈话，并说要他们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十分明显。我和冠华那时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反而加强了我必须与他

在一起，共渡险关的决心。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报告。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同意。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掉西瓜，捡了芝麻。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作检讨，有人传达说毛主席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一时人心惶惶。毛主席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冠华是做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末，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虽然这风浪的阴影在人们心中，尤其是部领导们的心中并未抹去。这年秋天，我随代表团再度去联合国开会。我们已经没有了前两届的平静心情，总担心这突然而起又无声消逝的风暴是隐藏在天际，不知何时又会卷土重来。对于政治的变化莫测，我和乔冠华都一片茫然。这年的10月，基辛格又要如期访华。我在纽约对冠华说，我担心基辛格访华又会惹出什么祸来。那年联大正逢上中东战争，安理会又在紧张开会。我劝冠华不如避开风口浪尖，给周总理写个报告，就说安理会辩论激烈，离不开，就不回国参加基辛格的接待了。冠华犹豫不决，但最后也同意了。不过周总理很快回电，严厉批评冠华怎么分不清主次，命他必须如期回国参加中美会谈。

10月的基辛格访问果然导致了后来的政治局“批周”会议。外交部姬、乔、黄、仲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指示”由她们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

这场批判促使了周总理癌症的急剧发展。他最终住院手术了。在一连串“批周”、“批林批孔”运动之后，外交部已失去了昔日的稳定，处于人人自危的心态下，党组也变成了惟“联络员”之命是从，不能做出任何独立决定的软弱班子。后来，邓小平同志的接任短暂地找回了一段平衡，可惜小平同志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毛主席通过“联络员”传达指示的党内不正常状况。而且一年半之后，“批邓”运动又最终把外交部拖进四分五裂的深渊。这一段最后的悲剧不堪回首。外交部“得天独厚”，是“联络员”最早传达“批邓”的单位。1975年11月，全国尚未行动时，外交部党组已开始“批右”，矛头直指乔冠华、黄镇、何英等人。冠华当时已是部长，他的“罪名”最重，指责他不执行毛主席“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政策，对美、对日右倾，是1973年周总理右倾错误的复辟；黄镇被指在驻外使领馆刮右倾翻案风，反对老、中、青三结合；而何英则是在子女问题上翻“文化

大革命”之案。一时间老干部岌岌可危。我们家成了老同志“秘密集会”的地点，商量对策。最后，由冠华和我上书毛主席，反映外交部情况，要求毛主席约束他的“联络员”。我们曾经得到印象，毛主席对外交部的状况不知情，因而很生气，他在12月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后亲自对我们及“联络员”说：“老干部还是有点用的，我就是最老的。你们要手下留情。”部内老同志深受鼓舞，但同时我们也不解为何情况并无好转。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外交部在老干部和“联络员”之间有矛盾，以后要她过问。后来，毛主席的秘书也在电话中对我说以后外交部的情况由江青转送毛主席，这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说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

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

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

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

往事不堪回首！三十一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

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 1983 年的 9 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间，难以摆脱。

冬去春来，当我写下这最后几行字时，我望见窗外院中春意盎然的老梨树。二十年来，它们忠实地与我一起走过那无数孤寂的夜晚，它们的枝枝叶叶记载着我那旧事残梦。这大概也是我对这四合院难以离舍的原因吧！梦虽残，但它毕竟曾经是梦。割断了，也许我能解脱，也许我会更加失落。我真的不知道……